

澳門學需要明確的幾個關係

婁勝華

[提要] 澳門學的研究需要明確幾個關係。在歷史與現實及未來的關係方面,澳門學不僅僅研究澳門歷史,而且是屬於貫通歷史、現在與未來的綜合性研究。在理論方法與資料利用方面,適應澳門獨特性的研究需要,澳門學需要創造自身的理論範式,並注意資料的實質性支持。從歷史研究的角度看,澳門學是地方學,但又不局限於地方學。在澳門學與澳門研究的關係方面,澳門學可以分為廣義澳門學與狹義澳門學。廣義澳門學與澳門研究之間不是包含關係,而是可以相互替代的關係。而狹義澳門學與澳門研究則是並列關係。

[關鍵詞] 澳門學 澳門研究 地方學 學術範式 關係

[中圖分類號] D676.5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1824(2020)01-0042-08

“澳門學”自 1980 年代提出後,時冷時熱,幾經沉浮。至 2010 年,因澳門基金會與澳門大學的力推而再度興起,並連續舉辦了多屆澳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有關澳門學的論述也逐漸增多。但是,迄今為止,有關澳門學的概念、研究對象、研究內容、理論框架與研究方法等事關學科建設的重要問題並未完全取得共識,仍然存在爭論。而實際上,要回答上述有關澳門學的問題,需要明確幾個關係。

一、歷史與現實及未來的關係

澳門學究竟是以研究澳門歷史文化為主,還是應該將研究的時限延伸至當下及未來,這是一個不無爭論的問題。要回答這個問題,可以回溯一下澳門學何以提出以及何以重新興起的歷程。

眾所周知,在 1980 年代,黃漢強、楊允中、陳樹榮等學者提出“澳門學”概念,具體地說,在 1986 年 11 月的一次有關澳門研究的學術研討會上,他們提出要建立“澳門學”的構思。那麼,為什麼會在 1980 年代中期提出澳門學呢?當時,正值中葡關於澳門回歸的談判進入尾聲,社會上時興澳門前途問題的討論。而此時提出澳門學構思不僅是對葡人進入澳門並管治澳門的歷史進行清理與總結,更重要的是對社會上尋求未來澳門管治與建設的一種學術回應與學術期待。通過研究澳門的過去展望澳門的未來。可以說,從澳門學提出之始,就意味著澳門學作為一個學科不僅需要研究澳

門歷史,更需要研究澳門的現實與未來。

從 1980 年代澳門學提出後,至澳門回歸,“一國兩制”從理論構想進入實踐模式,再到 2010 年代,隨著特區成立後博彩經營權開放推動澳門經濟強勁增長,城市建設與城市面貌日新月異,社會急劇變化引發居民擔憂長久建立的歷史情懷與人文傳統能否得到保存與延續。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澳門學再次得以復興,重新進入研究者的視野。而此次復興是對澳門居民陷入“文化焦慮”集體心態的一次學術回應,是社會群體性情感表達和心理發展的需要。^①可以說,澳門學的再度復興同樣反映了社會對澳門的歷史關懷與未來發展的憂慮,是要求學術界對“一國兩制”澳門實踐的反思與總結,並為澳門未來發展規劃方向與道路。

可見,澳門學從提出構思到再度復興,本身就是時代發展的需要,也是澳門社會發展與社會科學自身發展的需要。

首先,澳門學的提出與再度復興是澳門社會發展的需要。從 1980 年代澳門進入過渡時期,澳門如何順利地從葡管地區過渡到特區時期? 特區建立後,澳門如何成功實踐“一國兩制”並保持繁榮穩定? 這些都需要從學術理論上給予明確的回答。提出澳門學與重建澳門學就是希望能從學術上對上述問題加以研究與探索。同時,面對著澳門經濟迅猛發展與快速融入國家與世界,澳門更需要尋找與確立適合自身的發展定位,需要明確自身應有的價值座標。

其次,澳門學的提出與重建是對澳門居民精神文化需求的回應。進入 1980 年代,特別是回歸之後,澳門居民在物質生活上邁過了溫飽與小康逐漸走向富裕的新階段,物質生活富足後的澳門居民需要在精神生活上尋求文化標誌與價值滿足。加之,澳門素來以“賭城”形象示人,因此,需要尋找賭城之外的新城市形象。2005 年,澳門歷史城區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藉此契機,探討澳門作為中西文明交匯遺存成為新的學術研究內容。故而,重建澳門學就是為了滿足建構新的澳門城市形象與澳門居民尋找新的精神家園之需要。

再次,澳門學的提出與重建也是澳門人文社會科學不斷深化研究的需要。1980 年代,澳門研究總體上未有得到應有的重視,研究只在少數領域有所展開,如澳門歷史、經濟等領域,而政治、行政、社會、教育、衛生、文化、藝術、建築等領域的研究少有涉及。即使是有較多研究的澳門歷史領域,在研究理論方法及研究成果上,多以民族主義入手,在與主權相關的問題上中葡研究者之間存在著較大分歧。因此,澳門學的提出與重建就是試圖通過拓展新的研究領域,運用新的研究理論與方法進行新的學術探索與論述,深化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

可見,澳門學的提出與重建是時代發展的需要,也是解釋澳門歷史與現實以及規劃澳門未來的需要,此乃澳門學的初心。也就是說,澳門學不僅僅研究澳門歷史文化,而且要對發生在當下澳門的生動活潑的現實社會現象作出解釋,並通過歷史與現實的研究為實踐中的“一國兩制”提供學術說明與知識支撐,又通過研究發生在澳門本土的中西文明交匯共處的價值,為文化多樣性與人類文明交流共存提供“澳門方案”。因此,澳門學不同於以研究歷史文獻與文化遺存為主的敦煌學、西夏學與徽學,它是貫通歷史、現在與未來的綜合性研究。正如郝雨凡等所言,“我們可以用歷史的眼光分析今天的澳門,可以從歷史中尋覓解決今天問題的答案。我們為了今天研究歷史,也為瞭解歷史來分析今天。分析今天不僅是為了印證歷史,更是為了啟示明天。”^②

二、理論方法與資料利用的關係

與其他任何一門學科相同,澳門學研究離不開具體理論方法的運用、研究路徑與視角的切入及

研究資料的掌握與取捨。

以澳門學中過往研究較成熟的澳門歷史文化研究為例，就經歷了從殖民史觀到全球史觀的轉移。與殖民史觀相聯系的研究視角是從中外關係或中葡關係切入的研究，此類研究無疑將豐富生動的歷史生活概念化與平面化了，甚至可能將其遮蔽掉。因為從中葡關係研究視角來觀察澳門史，往往不可避免地使澳門成為中葡關係甚至中國與西方列強關係演變的歷史注腳。其結論最終難免落入東西方之間的衝擊—反應、挑戰—應戰、落後—先進，甚至純粹是實力對比的解釋模式之中。結果，必然重新回到以主權為中心的論證。

不是說中外關係視角下研究出來的結論，即澳門管治權的失去與回歸是中國由弱轉強的歷史見證有什麼問題，而是說中外關係視角下的澳門研究，導致澳門作為研究主體的地位很難得到重視，甚至完全消失在研究者的視野裡。因此，在一些講述澳門史的著作中，卻很難看到澳門本地社會真實的歷史場景，反而充斥其中的是豐富的中外交涉史料。對於有意瞭解澳門歷史的讀者來說，很難從中真切地感知與認識澳門。而澳門本地讀者閱讀由“他者定義”的澳門歷史，除了缺乏本土文明的受尊重感外，甚至無法藉此展開“生活意義”的歷史想像，更無助於理解潛藏於澳門歷史之中東西方文明共處與相互影響的社會特徵。

1999年澳門回歸後，澳門史研究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其中一個表現就是本土視角的引入。以本土人物、本土事件為研究對象，挖掘與運用澳門內部史料，重構澳門本土歷史發展線索與生活場景，是本土視角引入澳門史研究後表現出的不同於殖民史研究視角的新特徵。然而，當澳門史研究從殖民史視角轉向本土視角後，儘管不同領域的本土研究取得了相當進展，可是，過分強調從內部研究澳門史，強調澳門的地域性與特殊性，卻幾乎使澳門史研究變成與內地任何一個省區甚至市鎮地方史無異的地位，甚至成為一種方志研究。也即，看起來好似澳門歷史特殊性得到重視，其實是削弱與局限了對澳門文明價值的深度發掘。

新階段澳門史研究的另一個表現是嘗試引入現代化理論。現代化理論是一個具有強大解釋力的理論方法，尤其是用於解釋被殖民國家(地區)的歷史發展時。可是，澳門作為殖民地，與其他前殖民地現代化進程並不相同，尤其表現在經濟上，嚴格意義講，澳門從來就沒有經歷過像西方社會那樣的工業化歷程，雖然在1970~1980年代加工業有過短暫的輝煌，可是，隨著內地的開放，加工業很快外移內地，澳門維持著服務業為主體的產業結構，其中博彩旅遊業居於主導地位。與經濟結構相一致，澳門社會結構因博彩旅遊服務業吸附大量低技術勞動力，從而並未隨著後工業化社會來臨而出現一個以中產階層為主導的橄欖型社會，反而長期維持著金字塔型。至於政治結構，更不能因為有限度選舉在澳門的存在而斷言它已經完成民主化。因此，無論從那個方面看，澳門都屬於一個現代化的非典型地區，當典型的現代化理論被引入澳門歷史研究，其解釋力顯得非常薄弱。或許正是因為這個原因，現代化理論在澳門史研究中遠不如其他地區那樣廣泛而成果豐碩。

實際上，殖民史觀與現代化史觀都是以“歐洲中心論”^③或“西方中心論”^④為理論背景的。站在歐洲的角度看，在經濟、制度與觀念上，西歐各國屬於先發國家，其他地區，包括亞非等地，屬於後發國家(地區)。亞非等殖民地本來就是西方國家對外擴張的產物，在西方人看來，是他們的優勢文明向非西方地區擴散的結果。即使是獨立之後的前殖民地國家(地區)，因為經濟文化等方面處於落後狀態，這些國家(地區)要實現工業化、民主化與現代化，完成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變，就需要從技術、制度與觀念方面不斷學習與模仿西方。可見，殖民史觀與現代化史觀實際上是以西方特別是西歐地區為中心來看待人類歷史的。正因此，在葡萄牙及一些西歐國家有所謂“發

現事業”，在他們“發現”之前，“東方世界”難道是不存在的？顯然，這種歷史觀存在的問題是不言而喻的。此外，批評觀點還認為，在思維方法上，它把東西方關係看作是一種單向的而非互動的關係，是極其偏頗的。

在批評“西方中心論”並試圖建立新解釋範式的努力中，一種嘗試是以新的中心觀來取代它，比如中國中心觀或者東方主義。儘管有其一定理據，可仍未超脫“西方中心論”所存在的思維誤區。而多中心論的提出乃至於全球史觀的形成，則彌補了“西方中心論”遭遇的批評與挑戰。或者可以說，全球史觀是在對“西方中心論”的反省中逐漸發展起來的一種新的史學理論。作為包括史觀、史識、方法等在內的新史學理論體系，全球史觀以跨文化、跨民族和跨地區間的聯繫和互動為研究對象，觀察與研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地區之間的影響與互動過程，以及通過互動而產生的變化結果。它揚棄傳統史學的民族國家本位觀，以國家場域之外的社會空間作為考察重點，其不是要否認或取代國別史研究，而是把世界作為一個相互聯繫的整體看待，從而真正實現不同民族國家的歷史文化價值平等的研究共識。全球史在運用比較研究時更多地運用大範圍比較與“跨文化比較”，^⑤重視通過比較研究，捕捉歷史事件與現象的內在聯繫，尋找與發現其中變化的規律。同時，還有助於澄清與克服“西方中心論”影響下歷史研究中曾經發生的誤會與偏頗。雖然全球史是以跨文化、跨區域為歷史研究單位，並不意味著全球史從不進行區域研究或不關心“小地方”，而是反對將區域研究局限在孤立自足的封閉語境中進行研究，以開放的與外界互動的方式來比較與研究“小地方”，探討“小地方”與“大世界”的關係，把“小地方”置於“大世界”中，發現“小地方”的文化現象所折射的外部世界影響及其回應。^⑥可見，全球史觀確實在諸多方面超越了傳統史學的局限，它以民族國家之外的社會場域為研究單位，以跨文化互動為研究核心，關注互動因素與互動工具等議題的研究，^⑦並已形成一些基本共識：世界是一個聯繫與互動的整體，各民族國家並非孤立地存在；即使是特定地方也不是封閉自足的，地方歷史可以反映與折射其與更大範圍世界之間存在的超時空互動與影響；不同民族國家的文化雖各具個性特徵，互相之間卻並不存在高下優劣之分，文明是等值的。可以說，全球史研究超越了“歐洲中心論”或“西方中心論”，成為具有強大解釋力的研究工具。

自從1999年澳門回歸以來，澳門史研究重新開始思考與探索如何突破的問題。其中，本土視角的興起可以看作是新澳門史研究的重要標誌。也就是說，澳門史研究經過了從回歸前以外部視角為主到回歸後以本土視角為主的轉變。客觀地說，對於歷史上長期作為中外交流窗口又是早期全球化產物的澳門來說，內部視角的研究可能有助於彌補過去為外部視角研究所忽視的本土歷史片段或事件，但對於研究澳門社會發展機理則顯得有些吃力。正因此，一些澳門史學者再次將目光投向外部，試圖把內、外部視角結合起來尋找一種新的理論工具來推動澳門史研究走向深入，於是，以研究跨區域聯繫與互動見長的全球史觀就此開始進入澳門史研究的視野。

全球史理論關於“小地方”與“大世界”關係的論述給了澳門學在研究中西方文明在澳門交流以新的啟發，因為在澳門沒有一種文明吞併或壓倒另一種文明的情況，於是，有研究者就認為，中西文明在澳門相互碰撞，是兩種文明形態的互動與結合，兩種文明在澳門和諧互動，交融相生，從而“雜交”出一種新型的文化樣本和文明類型——澳門文化。澳門文化“互動相生”的文明發展模式，為世界提供了文明互動的新模式。^⑧

然而，事實上，從有限的文明互動的成果看，澳門中西文化的交流進程，主要體現於“交匯”而非“交融”。不同語言、宗教、建築、思想、文化、藝術長期以來在澳門平行並存，彼此的交流卻從來

沒有為澳門產生一種新的文明形式。實際上,澳門作為中西文明交往的地域,既未有衝突,也很少融合,也就是說,並未有太多的互動相生的文明成果,更多的是一種和而不同、中西並存的文明形態,屬於一種博物館式的陳列文明或拼盤文化。

可見,在理論運用方面,從殖民史觀到現代化理論再到全球史觀,在研究與解釋澳門時,都有其可用與進步之處,同時也存在著未必合適的缺陷,或許這正是澳門自身的獨特性所在。因此,如果澳門學要發展成為一門學科的話,既需要借用現存的理論方法,更需要創造屬於自身的理論範式。作為中西交匯之地的澳門集中了諸多異質性因素,而各種異質性文明和諧共存、不同而和,出現不同文明之間的相互尊重、各美其美、美美與共的文明模式。

同樣,在資料選擇上,由於澳門文獻史料數量龐大,初步統計有近百萬份之多;語種複雜,除了中、葡文外,還有英文、日文、西班牙文、義大利文、越南文、泰文等;存放地域廣泛,除了澳門本地外,也有在葡萄牙、巴西、西班牙、荷蘭、英國、日本、印度、義大利、泰國、菲律賓、越南等地存放;形式多樣,包括政府與自治機構文書檔案、海關與外交部門檔案、企業帳冊與社團檔案,個人書信日記與報刊,除了典籍檔案外,還有建築、碑刻、牌匾等實物遺存,以及語言、飲食、風俗等文化遺存,故而研究者很難全面掌握與運用。因此,就會出現在研究中對史料各取所需的情況。於是,在早期研究中,中、葡雙方研究者敘述的澳門歷史就出現各不相同的情況。同樣,認為澳門文化是中西文明互動相生的結果也需要得到大量的史實與資料的證明。在構建澳門學的學科過程中,應當注意史料的實質性支持,使澳門作為中西文化交流的獨特內涵,能得以系統及客觀地概括並提煉出來。

三、澳門與世界的關係

澳門學是研究澳門的學問。那麼,澳門學是不是一門專注於澳門本地研究的地區學?這是澳門學學科建設中需要回答的一個問題。首先,與中國的其他地區相比,作為一個微型地區的澳門是否具有特別的學術價值?如果澳門與中國的其他地區不存在太大的差別,那麼,就沒有必要對其進行特殊的學術關照。

眾所周知,在16~19世紀,澳門在溝通與聯繫歐洲文明及中華文明中,地位獨特甚至具有唯一性。西方文明“入口”與中華文明的“出口”,在很長的一段時期內基本上都只有澳門唯一的“通道”。無論是器物與商貿互通,還是中西宗教文化思想的交流,都必須經過澳門的“停留”與“中轉”。正是在見證中西文明相遇、交流與溝通以及深度參與西學東漸、中學西傳的過程中,澳門形成了不同宗教、種族、建築、語言、飲食、風俗、文化、藝術等相容並包、和諧共存的獨特文化性格與城市形象,構成了澳門與眾不同的社會特徵與人文格調。這些澳門的獨特性構成了澳門學研究的基本內容。“澳門學應該作為本土知識體系而構建,因為本土知識是本土居民長期生活中積累並世代相傳的知識,是傳統智慧和精神財富的結晶,是內在發展的基礎和核心要素,……澳門學首先要確立以澳門本身為主體的研究路徑,以澳門模式為核心研究命題。在此前提下,再以嚴格的學術規範挖掘、整理、研究本土知識,促進知識增量,加速本土知識體系的形成,逐步構建解釋體系即理論框架,促成澳門學的發展。”^⑨其次,以學術界認可的最早的澳門學著作《澳門記略》來看,該書是1751年由澳門同知印光任、張汝霖撰寫。全書分為上、下兩卷,上卷《形勢篇》和《官守篇》,《形勢篇》主要介紹澳門及附近地方之地理、氣候與軍事佈防等;《官守篇》則集中關注澳門歷史沿革,明朝與清朝的管治、相關政令與歷史事件等。下卷《澳蕃篇》,主要詳述外蕃之貿易往來、宗教信仰和傳教士在中國之風俗習慣等。作者“歷海島,訪民蕃,搜卷帙”,運用搜集的大量澳門地方第一手資

料,對澳門的歷史文化、地理風貌、人口構成、政治法律、風俗技藝、經濟民情等進行了全方位的研究與介紹,還配有插圖與中葡對照詞語資料。可見,作為歷史上第一部具真正意義的“澳門學”研究著作,《澳門記略》就是將發生在澳門本地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作為研究對象,反映了澳門與內地其他城市不同的社會獨特性。

澳門作為中國的一個區域,發生在澳門的故事理應成為中國故事的組成部分。通過研究發生於澳門的歷史與故事,進而總結出的澳門經驗與澳門價值,就成為中國經驗與中國價值的組成部分。16世紀中葉,當一群來自葡萄牙的商人到達澳門,並獲得明政府的同意,賃地而居,於是,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大一統中華帝國疆域內的澳門出現了由居澳葡人自治的聚居區,由此而開啟了澳門不同於內地其他城市的發展歷程。澳門的存在以及由一個華南漁村發展為多元開放的國際性城市的歷程,其豐富了中國社會與文化近代轉型的形式與內涵,其經濟及社會結構變革形態擴展了中國社會變化的多樣性。與此同時,澳門作為中國對外開放的窗口城市,呈現了中國與世界溝通接觸、面向海洋與外來文明的態度與姿勢,所以,有關澳門的學問是與中國密切相關的,澳門學就是中國學的一個分支。回歸後,澳門成為中國範圍內實行“一國兩制”方針的兩個特區之一,而“一國兩制”已經成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有機組成部分,因此,發生於澳門的治理實踐也成為中國社會治理的內容之一。

至於澳門學與海外漢學則更是關係非淺。澳門教區作為天主教東傳的據點,由羅馬教廷派往東方傳教的教士在澳門駐留與學習,其中,前往中國的教士們成為西學東漸與中學西傳的橋樑。中國典籍正是經過他們的翻譯介紹而傳播到歐洲,海外漢學也因此而起源。“澳門在鴉片戰爭之前的中外文化交流中,有其雙向溝通的獨特甚至唯一性。從這種意義上,澳門文化亦與當時開始形成的國際漢學結下不解之緣。可以說,國際漢學的最早雛形或早期形態就是‘澳門學’最初所涵括的內容,這種意義的‘澳門學’應為國際漢學之始。……‘漢學’最初被視為來華耶穌會的一門學問,早期漢學的實施並不是在‘海外’,而是在澳門,真正的‘海外漢學’其實源於‘澳門漢學’,隱含在‘澳門學’之中。”^⑩

實際上,澳門學不僅與早期海外漢學發展關係密切,它還具有跨區域、跨文明的特徵。澳門是一個小社會,卻聯繫著大世界。作為東西方文明對接、溝通與對話的窗口,澳門近連中華文明,遠接歐陸文明,它保存著兩種文明互相對視、相互交流與相互碰撞的歷史記憶,在推動中外經貿與文化交流、中國近現代化以及人類文明進步方面發揮了獨特的價值,折射出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的發展與變化。僅就澳門史研究而言,“不僅僅是涉及到中國的古代史、近代史和現代史,還涉及到葡萄牙史、世界史,要把澳門的歷史尤其是她的近現代史放到世界史的視野中去考察,才能更清晰地反映澳門歷史的全貌。”^⑪可見,澳門史研究需要從中國史、亞洲史和全球史的跨區域歷史視野加以審視,唯此,方能重構澳門史全貌,也才能真正凸顯澳門存在的意義與價值。

故而,澳門學是地方學,但又不局限於地方學,而是通過研究澳門“小地方”連結起中國與全球的“大世界”。

四、澳門學與澳門研究的關係

澳門研究是在澳門學提出之前就存在的,自從澳門學提出後,很多研究者在追問,澳門學與澳門研究之間是並列關係,還是包含關係,即究竟是澳門學包含澳門研究,還是澳門研究包含澳門學?對於澳門學來說,這確實是一個需要明確的問題。實際上,澳門學概念可以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廣

義的澳門學概念與澳門研究之間不是包含關係，而應是可以相互替代的關係。

與其他學科一樣，澳門學研究也可以分為基礎性研究、實證性研究（描述性研究、解釋性研究）與規範性研究的不同層次。澳門學的基礎性研究就是澳門的文獻與資料研究。文獻與資料構成了澳門學研究的基礎。眾所周知，澳門的文獻量多且面廣，形式豐富多樣。對於研究者來說，有其有利的一面，即數量多便於運用，形式多樣便於比較；而不利之處則在於，對於同一件事，不同的當事者運用不同語種記載的文本未必一致，研究者不但需要掌握不同語言，還需要進行反復的文獻對照校勘，方能從浩瀚的文獻中還原事實真相。因此，與較為單一化文獻研究相比較，澳門學的文獻基礎研究顯得尤為重要。

澳門學的實證性研究包括描述性與解釋性研究，即研究澳門是什麼樣以及為什麼是這樣的。因此，需要對澳門的歷史與現實進行分門別類的研究，包括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教育、衛生、體育、軍事、藝術、地理、交通、種族、宗教、建築、飲食、風俗、禮儀、對外聯繫等物質形態與精神生活各領域的研究。如果說澳門學是一門具有跨學科性質的綜合性學科，其綜合性就是來自於分門別類的專業性研究基礎。沒有專業性研究，就沒有澳門學。也有人將澳門學的研究對象確定為澳門歷史文化，認為“澳門學”是以澳門文化為研究對象的一門學科，研究澳門 400 多年來在東西方經貿互動和中西文化交流、碰撞、融合中形成和積澱的澳門文化，研究澳門文化獨特的個性、品質、功能及其形成和發展的規律性。¹²可是，既然澳門學是研究澳門的學問，與澳門相關的領域都應該成為澳門學研究對象，而不僅僅是澳門歷史文化研究，因為歷史文化只是澳門的組成部分。誠然，澳門歷史文化是澳門最有特色的研究內容，也是澳門其他各學科的研究基礎，因此，它也必然構成澳門學研究的基礎與特色內容。

澳門學的規範性研究可以包括理論性研究與政策性研究，即是對澳門不同領域研究成果的提煉及昇華，是從實證研究中抽象出具有普適價值的“澳門模式”與“澳門價值”以及為澳門未來規劃發展提供政策啟示，同時，也為人類不同文明之間和諧互動提供知識與經驗。可以說，理論性研究是澳門研究的形而上的抽象形式。而政策性研究則是為回歸後澳門在實踐“一國兩制”過程中所遇到的問題與困難提供解決方案，從而保障“一國兩制”的順利實施。一定程度上，如果沒有理論性研究，澳門學難以成“學”；而如果沒有政策性研究，澳門學存在的價值與目的將成疑問。

然而，若從狹義上說，澳門學作為一個學科，雖然與澳門研究一樣是以澳門為研究對象的，但是，它應更注重從現有的澳門研究中提煉出知識系統與學術範式。而系統性的知識形成依賴於對研究對象的深入認識與剖析，也就是說，澳門研究越深入，澳門學的知識系統越完善，可見，澳門研究是澳門學的基礎，而澳門學是對澳門研究的總結、概括與提煉。實際上，從發生的次序看，先有澳門研究，而後才提出澳門學。澳門學是隨著澳門研究的不斷深入而提出來的，是澳門研究的理論化與學科化的產物。具體地說，澳門學旨在建構本土知識體系，通過研究發生於澳門的社會事實以及澳門與外部世界的互動關係，探索與總結澳門社會發展規律以及“一國兩制”實踐的成功經驗，從而使澳門文化多樣性與社會和諧發展得到合理的解釋，並歸納與提煉出澳門的普遍意義，使本土知識具有普適價值，推動文明之間的對話與交流，為不同文明之間的共存共處提供“澳門經驗”，為澳門的未來發展提供知識基礎與價值支撐。也可以說，“澳門學是具有全球意義的地方知識”。¹³

由上可見，就廣義澳門學而言，其與澳門研究之間存在著可以相互替代的關係；而就狹義澳門學而言，其與澳門研究則是並列關係。澳門研究是澳門學的基礎，澳門學則是澳門研究的理論化與學科化。

五、結語

明確了上述幾個關係,可以為界定澳門學概念及研究對象與範疇等提供基礎與條件。首先,在歷史與現實及未來的關係方面,澳門學以研究澳門歷史文化為基礎,並通過歷史與現實的研究,為澳門未來發展以及人類文明的多元交流提供啟示,它屬於貫通歷史、現在與未來的綜合性研究。其次,在理論方法與資料利用方面,適應解釋澳門獨特性的需要,澳門學在運用現有理論方法的同時,需要創造自身的理論範式,並注意資料的實質性支持,避免各取所需地利用資料。再次,在研究區域方面,澳門學是地方學,但又不局限於地方學。作為中國的一個區域,澳門經驗與澳門價值是中國經驗與中國價值的組成部分。作為中華文明與西方文明交流互動的城市,澳門學還具有跨區域與跨文明的特徵。澳門是一個小社會,然而,通過澳門學的研究,澳門的“小地方”卻連結起中國與全球的“大世界”。最後,在澳門學與澳門研究的關係方面,澳門學可以分為廣義澳門學與狹義澳門學。廣義澳門學研究包括基礎性研究、實證性研究與規範性研究的不同層次。它與澳門研究之間不是包含關係,而應是可以相互替代的關係。而狹義澳門學是對澳門研究的總結、概括與提煉。因此,澳門研究是澳門學的基礎,澳門學則是澳門研究的理論化與學科化。就狹義澳門學而言,其與澳門研究則是並列關係。

①參見林發欽:《澳門學的新生:走出文化焦慮》,澳門:《澳門日報》,2014年4月30日。

②郝雨凡等:《全球文明史互動發展的澳門範式——論澳門學的學術可能性》,廣州:《學術研究》,2011年第12期。

③ Paul A. Cohe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④Edward W. Said, *Orientalism: Western Conceptions of the Orient*,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8.

⑤有關大範圍比較與跨文化比較研究的內容可參閱艾達·布洛姆(Ida Blom):《國際比較中的性別與民族國家》,見夏繼果、傑里·H.本特利主編《全球史讀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251~253頁。

⑥夏繼果、傑里·H.本特利主編:《全球史讀本》導言,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XI-XII頁。

⑦L. S. 斯塔夫里阿諾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吳象嬰等譯,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9年,第130頁。

⑧參見林廣志:《試論澳門學的概念、對象及其方

法》,廣州:《廣東社會科學》,2010年第6期;郝雨凡:《澳門學:中西文化互動共生的範型》,澳門:《澳門日報》,2014年4月02日。

⑨吳志良:《全球化背景下新的學術增長點》,澳門:《澳門日報》,2014年4月2日。

⑩卓新平:《中西文化交流中的澳門研究》,澳門:《澳門研究》,2015年第2期。

⑪劉澤生:《回歸十年澳門研究的回顧與思考——以澳門歷史研究為中心》,澳門:《澳門研究》,2010年第1期。

⑫黃漢強:《關於“澳門學”對象與方法的思考》,廣州:《學術研究》,2001年第7期。

⑬吳志良:《澳門學:歷程、使命與發展路向》,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18年第2期。

作者簡介:婁勝華,澳門社會治理研究學會會長,博士。

[責任編輯 劉澤生]